

会议综述

探索中国特色的综合解决老龄问题的未来之路

——“全国家庭养老与社会化养老服务研讨会”纪要

穆光宗 姚 远

1998年4月10日至14日,在春意盎然的厦门市,召开了由中国老龄协会和中国老年学学会联袂举办的“全国家庭养老与社会化养老服务研讨会”。研讨会开得热烈而充分,交流中有争鸣,争鸣中有提高,求同存异,生动活泼。现将研讨会的一些主要观点概要如下,以飨读者。

一、家庭养老和社会化养老服务等方式的理论探讨

对家庭养老,社会化养老服务等方式的理论探讨集中在概念、条件和演变趋势等三个方面。

1. 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

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对这两个概念的界定,有两种观点。第一种,以“养老的经济来源”作为划分的标准,主要依靠离退休金和社会保障生活的为社会养老,如城市中的离退休人员,城市和乡村中的“五保户”等。主要由家庭及其成员供养的为家庭养老,如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中的家庭妇女,未就业人员等。这种观点是目前较为通行的观点。第二种,以“养老支持力”作为划分的标准。穆光宗认为:养老涉及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个方面。仅仅从经济供养角度界定养老的概念,很难区分实际生活中存在的大量混合型养老模式,也很难说明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之后,老年人的照料问题、服务问题和慰藉问题将超过经济供养问题的现实。因此,在界定养老的概念时,“是否可以考虑二个原则:一是经济为主原则。在分类时考虑经济变量为主,非经济变量为辅。二是问题感受原则,这一原则实际上是要显示出老年人的个体差异。”穆光宗的观点表明,在具体界定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概念时,不应从单一角度去考虑,也不应

用概念框套现实,而应根据现实界定概念。

养老的实质是代际交换。而养老模式的选择是由生产力水平、社会结构、家庭结构以及文化类型所决定的。这是与会代表的共识。问题在于,当生产方式从小农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之后,家庭养老是否必然为社会养老所替代?其程度如何?

代表们普遍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家庭养老的功能会弱化,于景海认为:经济水平的提高,使老年人寿命延长,人数增加,但家庭赡养能力并未同步提高,从而造成老年人需求和家庭赡养能力之间的矛盾。穆光宗认为:家庭小型化趋势,家庭内“重幼轻老”和子女忙于工作,老年人口高龄化对生活照料需求的增加,使传统家庭养老中子女全身心照料老人的状况难以维系,姚远认为:传统养老文化的衰退,社会主义养老文化建立迟缓,家庭养老的行为模式缺乏规范性,随意性增强,因而家庭养老的功能在弱化。除了经济水平、照料能力和文化依托外,有的代表还通过介绍新加坡家庭养老模式,说明国家和社会在支持家庭养老方面的重要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台恩普在从宏观上阐述解决中国养老问题的养老体系时明确指出:“家庭养老没有在政策上得到应有的安排。”这些观点说明,中国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尽管传统的家庭养老在弱化,但大多数代表认为,由于家庭养老独特的文化价值和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的功能,家庭养老可以弱化,但不会消亡。熊必俊指出:“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的发展不是两者之间的简单取代,而是家庭与社会在承担养老义务中主次角色的换位。”

在论及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同时,社会养老或

曰社会化养老服务也就自然构成了热门话题。代表们认为：家庭结构的改变，养老观念的变化，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人数的增加，提出了社会养老的必然性，而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提供了社会养老的可能性。

代表们普遍认为：在我国传统文化模式和“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龄化形势下，家庭养老将会在相当时期内依然是我国的主要养老方式。但是，家庭养老的弱化又使家庭养老“孤立难支”。大力促进社会化养老，推动家庭养老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演变，或者说从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的过渡，是我国养老方式发展的必然趋势。

2 自我养老的方式

自我养老是这次研讨会上提出的一种养老方式。自我养老的概念有两种表述。第一种，自我养老是指既不靠子女和亲属（或无从依靠），又没有离退休金的社会保障而主要靠储蓄或劳动收入或其它收入（如租金，股金）来维持生计的养老模式。第二种，自我养老是指自力养老（不靠子女，退而不休）为主，外力养老（老年夫妻助养，老年产业助养，老年保障助养，社会公益事业助养，政府政策助养）为辅的养老模式。这两种表述的共同点是，老年人自我提供经济支持。

任何一种养老方式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自我养老作为一种养老方式，也有其值得探讨的方面。比如，自我养老注重自我经济支持，那么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如何解决？对于高龄老人，丧失劳动力的老人，没有储蓄或离退休金的老人，又应如何自我养老？自我养老与社会养老的区别是什么？

3 居家养老的方式

居家养老是继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之后讲得最多的养老方式。居家养老是一种与机构养老相对的养老方式，这种方式，家庭养老可以采用，社会养老可以采用，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也可以采用。

居家养老是建立在个人、家庭、社区和国家基础之上的。它是以居家养老为形式，以社区养老服务网络为基础，以国家制度政策法律管理为保证，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的养老体系。

二、对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模式的实践和思考

这次研讨会的特点之一是会议代表中有很多基层老龄工作者。他们不仅带来了各地老龄问题的情况，而且带来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方式的经验

和思路。这些经验和思路的共同点是依据各地客观实际，建立多渠道、多元化、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最大程度地满足老年人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方面的需求。由于各地情况的差异，养老模式和经验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

1. 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社区为老服务体系和家庭赡养老人相结合

袁辑辉认为：在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逐步过渡中，既不能超越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过急地全面实行社会养老，但也不能忽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将家庭养老凝固化，停滞不前。而应该在坚持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的原则下，积极建立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扩大社会化服务范围，同时继续发挥家庭在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方面的作用。根据上海的经验，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应以社会养老保险为重点，既强调其政府行为的特征，又强调其社会共同责任的特征。社区为老服务体系应注意对老年人的照料服务，把上门服务放在重要地位，并积极开展社区养老设施，充分调动和开发社区一切资源（人、物、部门、网络等），形成老服务的合力。家庭养老应在保持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注意建立政策支持机制，使家庭养老适应家庭和社会的变化。

2 家庭保障为基础，社区保障为补充，自我保障为依托

改革开放以后，苏南农村开始富裕起来，逐步建立起以“家庭保障为基础，社区保障为补充，自我保障为依托”的养老保障模式。

江苏省老年学学会认为：家庭养老的保障功能是明确的，家庭养老不仅满足了老年人的需求，为家庭和老年人生活带来了幸福和欢乐，而且为国家节约了当前难以筹措的大量资金，促进社会安定，苏南地区强化家庭养老的主要作法是：贯彻《老年法》，提高法制水平；签订赡养老年人义务书，使家庭养老规范化和制度化；建立舆论环境，强化家庭养老观念；政策和行政支持。家庭养老是我国传统的养老方式，但随着老年人数增加，城乡人口流动加快，家庭小型化和子女工作负担加重情况的出现，家庭养老功能开始弱化，从而要求社区提供更多的养老保障。苏南的主要作法是：养老补助；医疗服务；供养五保户；救济与慰问。苏南农村老年人还认识到：养老保障不单是家庭和集体的责任，老年人自己也应有一定的自养义务，只要老年人身体条件允许，就继续参

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尽可能劳动自养,弥补家庭和社区保障的不足。

苏南养老模式的启示,一是解决养老问题,需要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二是经济水平不是唯一的因素,精神文明和法制化建设必须跟上,三是对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难度不能估计过低。

山东省平阴县也有类似的经验。李灿杰认为:该县的经验之一是从政策和思想上肯定养老形式的多样化。如,对五保户老人,把分散供养与集中供养视为完全平等,并列的形式,给予同等重视。对于女儿养老和儿子养老,同等权利,同等对待,女娶男户还有政策倾斜。

3 家庭养老为基础,单位管理为重点,社区服务为依托,个人自养为补充

本体系是针对城市养老而言的。江崇寿认为:之所以在家庭,社区,个人之外又加上单位管理,是因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养老保险制度社会化水平很低,离退休干部大量生活需要,仍然要由本单位承担和提供物质保障,原单位做好管理工作是非常必要和可行的,单位主要负责理顺关系,纵横联系;生活保障,政治待遇;组织生活,交流思想。

4 社会支持下的家庭养老

部分代表主张,根据我国国情和老年人的具体情况,我国应采取社会支持下的家庭养老模式。

孙学士认为:以我国的国力国情而论,我国亿万老年人的“老有所养”还必须依靠家庭。因此,如何维持家庭养老的传统方式,如何发挥家庭在养老中的积极作用,已成为我国解决亿万老年人“老有所养”的重要议题。为了强化家庭养老,社会应将支助家庭养老作为一项重要政策,建立支助家庭养老的激励机制,发展支助家庭养老的社区老年人生活服务业,普及家庭养老的保健常识和扶助技术,努力构建家庭养老的无障碍环境,建立老年人才市场,等等。

王伦贵通过对陕西省安康市的调查,姜其龙通过对贵州省六盘水市的调查,都认为:家庭养老依然是我国大多数农村老年人无可选择的养老方式。因此,强化家庭养老应该是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主要思路。加强思想教育,营造敬老氛围,签订赡养协议,加强执法力度,推进养老保险,建立老年组织,都是强化家庭养老的行之有效的办法。

朱显才在论述家庭养老与社会助老时指出:解决养老,首先要敬老。能不能敬老不是由贫富来决

定的,而是意识与感情的问题。有了敬老的认识与感情,才会有心,有力,有钱,有精神和有办法解决老年人问题。

5 其它养老模式

宋玉文关于养老院的实践与思路,李澍卿关于发展互助组合养老的思路,陈波关于建立农民退休制度的思路,黄明科关于农村“一家两户”养老模式的总结,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养老的思路,有的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这些思路和实践,对于探讨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模式,无疑是非常重要和具有启迪意义的。

三、老年社区服务问题

老年人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济保障,解决“老有所养”。二是服务保障,满足医疗,照料和各种精神需求。社区服务,一般定位在第二个方面。为此,《老年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发展社区服务,逐步建立老年人需要的生活服务,文化体育活动,疾病护理与康复等服务设施和网点。”

代表们认为:实施老年社区服务,实际上是由国家和社会承担起部分养老工作,这种需要是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提出来的。江苏省老年学学会认为:发展老年社区服务,是人口老龄化的时代呼唤和经济建设两个根本性转变的需要。也就是说,在宏观上,发展老年社区服务,是建立与经济建设两个根本性转变相适应的现代人文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微观上,老年人数的增加和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以及老年人对晚年生活更高层次的需求,都是传统家庭养老所无法解决的,从而提出了老年社区服务的必要性。

从代表提交的论文看,老年社区服务的功能主要是对家庭自我服务的补充。它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帮助家庭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天津市南开区老年生活保障调查显示,在老年人的日常照料方面,在社区提供的初级医疗保健,包括健康咨询和社区就近医疗方面,在丰富和调节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在为老年人提供家庭调解和法律保障方面,社区服务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组织协调,贵州省老龄委在排烧村“四结合”养老的调查报告中指出:社区在国家,社区,家庭,个人四个层次相互结合,相互补充的养老体系中,起着组织和协调的作用,是整个养老体系的纽带和关键。贯彻国家的法规,政策,强化敬老养老意识,督促家庭养老等,都需要社区组织和协调。

老年社区服务能否完全代替家庭养老自我服务？代表们普遍认为：在相当时期内是不可能的。一方面，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达不到；一方面，家庭养老的文化功能是社区服务无法取代的。

老年社区服务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有些地方的问题还比较多，比如，领导不重视，没有行政统管部门；认识不统一，工作不协调，缺乏统一规划；税收卡得严，社区服务业举步维艰；社区为老服务，尚未形成体系，等。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代表们提出了建立老年社区服务体系思路。庄佩雯以上海静安区老龄事业发展规划为依据，认为其基本框架应该是：有计划地建造和改建一批必要的服务设施，形成多层次的网络化的服务基地；围绕“五个老有”形成全方位的服务系列；根据不同层次老年人的需求，采用灵活多样的服务形式；产业化经营和群众性互助相结合的服务机制。庄代表还提出了建立相应的运行机制的构想，如，强化政府的主导作用；充分挖掘和利用现有的社会资源，为老年人提供各方面的服务；多渠道的兴办老年福利事业；充分发挥老年群体的自我服务作用。天津和平区老龄委则强调，不应孤立地建立一个一个的老年社区服务网络，而应将社区服务网络纳入整个社会老年照料体系之中，这是社区服务网络的力量之所在；也不应只面对高龄和困难老人，而应把社区服务项目扩大到面向全体老年人，这是社区服务网络的生命之所在。魏仲吾从机构设置、法制保障和经费筹集方面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老年社区服务，随意性较大，因此建立一个衡量标准是非常重要的。天津南开区调研报告提出了三个标准：第一，老年人对社区照顾的满意率；第二，老年人享受社区照顾资源的覆盖率；第三，老年人照顾的参与率，这三个标准的重要性和启迪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四、家庭代际关系问题

家庭代际关系是研究家庭养老和社会化养老服务的重要方面，在这次研讨会上代表们一般关注两个问题。第一，家庭代际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第二，应如何建立良好的现代家庭关系？

根据安徽省六安地区家庭养老情况的调查，朱继臣认为：我国家庭代际关系发生了三个转移：由传统的主干家庭向核心家庭转移；老年人在家庭的地位向独生子女转移，老年人不再是家庭的中心人物；老年人在家庭中的权力向青年人转移，由青年人当

家。这三个转移直接影响了家庭养老的功能。比如，老年人家庭地位下降，老年人自尊心理受到压抑；家庭无法全力照顾高龄老人和患病老人，老年人心理负担加重；老年人家庭生活内容日渐空乏，天伦之乐淡化。

郑玮斌认为：老年人家庭地位的高低可从分析老年人在家庭中经济支配权和家庭主要事务决定权入手，考察其经济地位和受尊敬程度，综合出对老年人家庭地位的评价。在前工业阶段，老年人在家庭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家长地位。而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老年人的家庭地位日益下降。究其原因，主要有农村工业化，计划生育，思想观念的多元化，文化程度低和外部干预能力弱化等。

在讨论家庭代际关系时，段江林还对孝心作了分析。他认为：对孝既不能极端化，又不能采取虚无主义态度。要树立正确的孝心观念。徐勤指出：生活的重担会成为制约子女行孝的客观障碍。因此，社会也应帮助解决成年子女生活中的困难。

虽然在总体上正如郭志刚、陈功所分析的，当年费孝通所称的中国传统的代际间的“反哺模式”得到了维系，但个别年龄组的老人，特别是城市男性老年人已经突破了“反哺模式”，而是出现了与现代化过程相匹配的变化——自求多福、自我养老。周承昭的观察告诉我们，关于代际关系，现实生活中已提出了新的问题，代际关系的不正常如何纠正？实践呼唤着新的理论解说。经济上“吃老”、家务上“累老”、居住上“挤老”等在城市并不鲜见的现实说明“反哺模式”在一些地区的一些人群中已分崩离析，难以后继。

五、精神赡养问题

完整的养老概念至少涉及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个方面。这一点成为与会代表的共识。提交的论文中也有不少涉及这一方面的。

北京市西城区老龄委于1996年8月采用典型调查的方法，对206位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进行了入户调查。结果发现，近九成的老人对晚年生活基本满意，但与子女分开居住的高龄老人精神赡养问题较为突出，生活中感到孤独和寂寞的高龄老人大概占被调查人数的34.25%，其中多数是一代户和独居户老人。从老年心理学角度讲，心理孤独、精神无慰藉对老年人的伤害极大，陕西省宝鸡市滑滨区提供的老年人自杀的个案给人印象深刻。

精神赡养是重要的，但又是容易做到的。一

些文章在梳理古代文献时已有所总结。例如，江崇寿如此诠释孔子的“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区别？”——狗和马都能被饲养，如果不从精神上尊敬和慰藉父母，那又有什么区别？圣人又敏锐地谈到“色难”，即对父母真正和颜悦色并不容易。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同志已经观察到一个不争的事实：随着老年人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的精神生活需求正在逐步突出出来。天津南开区老年生活保障调查组于1997年8月在辖区内调查了500余位65岁以上老年人，调查发现：在老年人中存在着一些精神孤独等精神保障方面的问题。在回答日常精神感受时，认为自己没有孤独感的老年人占75.8%，认为自己经常或有时有孤独感的占21.4%，回答不知道的占2.7%。此外，在问及干事时是否有打不起精神的情况时，回答经常或有时有的占39.4%，不知道的占3.7%，也表现出同样的心理倾向。但调查报告没有对老年人心理危机的成因作出比较透彻的解说。不过，文章强调了社区的各种照顾资源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和调节老年人心理状况的作用这一点是值得重视的。

天津武清县对1020个家庭中1428名60岁以上老人的调查给我们传递了更加令人不安的讯息。武清老龄委的调查结论是：在精神生活方面，绝大多数老人感到孤独、寂寞，不能与子女经常沟通，在感情上形成代沟，精神赡养问题被大多数家庭忽视。90%的老人希望分居的子女能经常来看望自己，多交心，对共居的子女，相当部分老人也希望能在感情上多沟通。精神赡养问题反映了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缺损。看来这方面的地区差异较大，但我们还不太清楚形成诸多差异的原因和机制。

一些文章也对农村并不鲜见的吃“转圈饭”现象提出了批评。所谓吃“转圈饭”，也就是靠子女轮流赡养。这种在子女们看来比较公平的养老方式却可能有损农村老人的生活质量。黑龙江省海林市老龄委提供的一个个案表明，吃“转圈饭”可能使老人成为谁也不要的“皮球”而被踢来踢去。内蒙古兴安盟老龄办通过对农村牧区家庭养老状况的调查，发现了三个问题：一是这种方式使老年人生活不稳定，缺乏规律性；二是轮到谁家，要看子女们的脸色行事，好吃赖吃都得吃；三是长期这样会给老人增加思想负担，从而影响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对此，天津武清县老龄委提出的二点建议是可资参考的：一种做法是让老人在几个子女中选一个居住，经济收入等条

件相对优越的，其他子女可经常看望，并按时给赡养费，有病时则由子女共同负担。另一种选择是在家庭进入空巢期后，居住上采取代际分离的做法（俗称“分家”），老人自留相应财产，过独立生活，与此同时，子女则每月给一些钱物。武清县老龄委对农村存在的将老两口分开赡养的做法也提出了批评。

总的来看，子女不在身边或子孙不孝，养老方式选择不当、丧偶寡居以及高龄老人的精神赡养问题比较突出。对此，除了弘扬崇老文化，在赡养者心中培植孝心以外，如何在社区服务中注入精神赡养内容也是值得关注的。天津和平区老龄委通过创办老年人聊天站、知音站、舒心会、谈心服务组等各具特色的服务组织为改善老年人的精神赡养质量作出了贡献。随着家庭养老功能的外移，看来只在家庭养老的框架中去寻求解决精神赡养问题的钥匙已越来越不合乎时宜。可以预言，社区服务在全面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方面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家庭和社会之间，养老功能不仅仅存在着替代性，也存在着互补性。

六、养老经济保障问题

经济保障是老年人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其重要性显而易见。那么，中国老年人养老经济保障的现状如何呢？

在理论上，养老经济保障既可以是老年人自己、也可以是老年人的亲属（如配偶和子女）、以及集体和国家。郭志刚、陈功通过对中国老龄科研中心于1992年进行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的磁盘数据资料的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总体上，无论城乡，代际经济流动是子代流向父代而不是相反。其中，城市有子女老年人平均每人获得子女净供养54.65元，农村有子女老年人平均每人获净供养235.49元。这里净供养的涵义是供养金额与抚养金额相减的差值。但由此能否进一步引出结论“说明子女供养老年人仍是我国养老的主要方式”尚可讨论。因为这里涉及到一个至关重要的基本问题，即在养老供养力（或称支持力）多元化来源中到底以何者为主。我们知道，养老供养力不仅有来自子女的净供养，而且也可能有老年人自己的劳动收入、积蓄或其它收入，如集体补助、退休金等。一种养老方式的归类，在经济保障上恐怕要看占主导的供养力来源。显然，郭、陈对代际经济流动的分析只是局限在父代和子代的相对关系上，并没有回答上述问题。

令人高兴的是，杜鹏和武超利用国家统计局于

1994年10月1日进行的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中首次设置的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据分析了中国老年人的主要经济来源。他们发现：在我国老年人主要经济来源的排序中，57.1%的老年人主要靠子女或其他亲属提供经济帮助；其次，25%的老年人主要靠自己的劳动收入；居第三位的是离退休金，占15.6%；主要靠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及其他来源的占1.0%。也就是说，八成以上的老年人其主要的经济保障来自子女、亲属和自己。杜、武一文实际上对穆光宗提出的从“养老支持力来源”角度来划分家庭养老、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的概念架构提供了更为形象的定量解说。杜、武一文还有这么一些发现：老年人自身经济供养能力随年龄增大而下降——劳动收入在总体上虽然是老年人的重要经济来源，但实际上，以此为主要经济来源的老年人主要是低龄老年人，而且这种来源的持续时间并不长。60岁、65岁、70岁等若干年龄是老年人经济来源剧变的重要分水岭。从性别差异看，男性老人较少依赖子女或亲属，而大多数女性老人则以此为主要经济来源。这或许可以说，女性老人经济保障的风险更大。若再加入城乡因素，则可看出：城市男性老人自我经济供养力最强，而农村女性老人自我供养能力最弱。老年人的经济保障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别：上海和北京人口老龄化程度虽然最高，老年人自我保障能力却也最强；耐人寻味的是，在经济发展较快、老年人口比例也较高的江苏、浙江、广东等地区，老年人以离退休金为主要经济来源的比例很低，而依靠子女或其他亲属的比例较高，这一现象值得深入研究。

养老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是一个重要话题。社会保障是指以国家为主体，通过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依据法律规定对社会成员因年老、疾病、伤残而丧失（包括暂时丧失）劳动能力，或因失业、灾害和不幸事故以及曾为社会尽过义务而生活面临困难者，提供物质帮助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在中国，社会保障包括了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其中，社会保险又可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是从1986年开始启动的，迄今为止基本上围绕社会保险特别是养老保险展开的。叶文振回顾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十年改革，明确指出我国养老社会保障的重点是在农村，并建议调整国家在社会保障方面支出的城乡结构，适当增加对农村的投入。乔晓春在大会发

言中宣读了他随全国政协人口组下乡调研农村养老保险的一份报告，他认为：目前农村养老保险解决不了现在40岁以上人口的养老问题。农村养老保险在贬值，政府的承诺无法兑现。问题之一是参加保险的人越多，国家赔的越多，目前已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桂世勋介绍了上海市老年保障体系及其运行机制的研究。桂教授所指的老年保障体系是广义的，主要包括老年人的收入保障、医疗保障和服务保障这三块。课题组认为：上海未来老年保障供养水平的目标模式是“保基本、多层次”，上海未来老年保障支持系统的目标模式是“政府、社会、单位、家庭、个人相结合”，而老年保障管理体制的目标模式则是，“两头统，中间分”。上海市老年保障体系的运行机制则包括道德维系机制、成果分享机制、利益激励机制、社会监督机制、法律强制机制。

福建省退休职工管理委员会于1997年下半年通过调查发现了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突出的就是企业养老保障制度已难以为继。福建全省有156个企业停发了涉及5400多名离退休人员的退休金累计达330多万元，最多的是31个月分文未发。有一个市退休职工5.7万人，被拖欠的退休金总额达180多万。据1996年统计，全省亏损企业达1372个，停产、半停产企业有901家。就全国来说，目前明亏、暗亏、盈利的三种企业各占1/3。严峻的事实告诉我们，退休制度在一些地方已形同虚设，养老金不仅偏低，而且缺乏保障。有鉴于此，叶炎义提出了对离退休职工分步实施社会化管理的思路。他对“离退休职工社会化管理”的界定是：根据我国国情国力和离退休职工的生理、心理、社交、安全的需求，社会化管理必须以建立国家、社区、企业和家庭四个结合的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体系为基础，逐步扩展和形成社会化管理所必备的，为广大离退休职工服务所必须的以社区为中心的管理服务、卫生保健、文化教育、人才二次开发、文体活动和临终服务等六大服务体系，为广大离退休职工“老有所养、所医、所为、所学、所乐、所恋、所终”提供良好服务。社会化管理是政府行为。叶文还做了一些很有针对性的对策探讨。例如，建立社区退休人员管理机构，要“四先四后”，建立退休管理社会化体系，要“四个结合”等等。此外，叶文对社会统筹的异议也值得我们重视。

一些论文探讨了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养老保障体

系。目前的情形是,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在逐步削弱,集体经济组织供养的“五保户”和“敬老院”也存在不少问题。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作为一种新的养老形式在农村越来越受到欢迎。到1996年底,全国已有15751个乡镇建立了农村社会保障网络。农村养老保险具有明显的社区性和多样性,罗文认为:无论哪一种形式的养老保险都是按照一定地域内的社会群体组织起来的社区互助;另外,农村养老保险形式是多样的,如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办的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保险、民办教师养老保险、乡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老干部、老党员、老劳模的养老保险、部分村干部保险、民政部门办的五保户、孤寡老人的养老保险、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等等。资金渠道一般都坚持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扶持,但分担的比例因地而异。罗文还讨论了建立农村养老保险的基本原则、基本内容等。山东省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试点和推广上在全国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其中平阴县又是走在比较前面的。平阴县老龄委和民政局联合进行的老年保障体系调查,展示了一个初具架构、前途光明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平阴县1992年开始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当年投保率(投保人数占20—59岁应参加投保人数的比重)即达82%,以后呈增长趋势。平阴县做法的一个特点是无一例强制。目前农民收入不高也不稳,奉行自愿原则是合适的。李灿杰、王贵田在讨论中也指出了养老保险中的不足,一是已进入老年而未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老年人,二是年龄偏大、投保时间短、投保金额少、“保障”作用弱的老人。由此可见,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和保障作用是有限的。

江苏金坛市老龄办通过对本市农村养老保险的调查发现,自1992年以来,经过多年的努力,投保率还不到20%,在理论上我们不仅已经认可而且在不断鼓吹养老保险,但为什么金坛市与前述的平阴县反差如此之大呢?从金坛的调查来看,已参加投保的主要是村级干部和乡村企业职工,多为集体投保和一次性投保,完全的纯农业户还极少。多数农民抱着怀疑、观望的态度。从分析来看,至少有两个因素影响了农民的投保决策。一是政府宣传不够,多数农户对养老保险的意义、好处并不了解,对缴费办法、养老保险费的计算办法不清楚,以致于不少人误

以为是又一种集资,望而却步。二是农民有许多顾虑。例如,怕政府说话不算数,将来不能兑现。这种担心和不信任说明了政府的信誉危机,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还有怕政策变的。据称农村养老保险迄今已有数年,但国家没有立法——无法可依,你叫投保者如何放心得下?!再者,就是怕贬值,到头来屈指可数的保险金仍不能解决养老问题。从其它调研来看,金台反映的情况具有某种普遍性,“养老保险中的社会心理问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重要话题。不切实地加强相关的制度建设,农民的心理障碍就很难消除,养老保险造福群众的愿望也就很难实现。总的来看,养老保险还是新生事物,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还很多。

七、老年人的健康及其相关问题

对老年人来说,健康是最可珍视的“资源”。没有了健康的依托,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养等等就很难保证。本次研讨会也有不少论文涉及这一话题,一些研究也提出了颇有价值的见解。

太原的王俊廷系统地探讨了衰老环境观。他认为,有差异的衰老后果是错综复杂的生活环境因素潜移默化作用于人的机体之后所带来的。通过对太原北城区420名老年人分组定项的调查,发现:老年人的经济状况、生活方式、子女孝否都会给老年人的健康带来不同的影响。通过对一个个案的分析,王文结论道:老年人的消极心理并不是个体老化的必然产物,而是外部环境和内在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倘有积极的环境刺激,智力的发展也可在生命晚期出现。所以说,一个人的心理活动究竟是健康向上抑或衰老后退,关键在于年事已高和机体衰老,而是在于他(或她)到底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和氛围中。这里隐约地传递了一种积极的老年价值观。河北的王玫概括了老年人的心理特质,消极的有孤独感、失落感、空虚感、自卑感、疑虑感、老朽感;积极的有满足感、安乐感、奋进感,并提出了老年人心理调适的五个措施,即控制情绪,积极生活;不倦学习,广交朋友;生命不息,活动不止;互敬互让,家庭和睦;心理咨询,社会重视。乐观主义养老学的倡导者王兴华则再次呼唤:开创高龄老人的第二个春天。并提出了若干老人心扉的对策性思路,如建立高龄养老精神支柱,高龄养老八项注意事项以及尽量保持自己同大千世界联系的观点,等等。朱即明认为:有必要在老年人中倡导“第二人生”。

北海的钟礼观则强调了老年心理与生理的关

(下转第17页)

可以推迟一部分生育,对我国人口增长有减缓作用,同时也使年轻夫妇能实行真正的“家庭计划”。

影响新婚夫妇初育时间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传统、不同生活环境以及工作性质、居住条件、家庭影响、经济实力、个人避孕知识、生育意愿等都会产生作用。有时因为意外事件的发生(如避孕失败)导致计划的改变。因此,定量研究的范围和能力是有限的。加之数据的不足,更限制了分析的准确性。本文仅试图在现有数据的基础上对初婚—初育间隔做一描述和初步分析,并引发相关的研究和讨论。

参考文献:

- 1 李伯乐. 90年代初中国妇女的避孕情况分析. 见: 蒋正华主编. 1992年中国生育率抽样调查论文集.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1996
- 2 姚新武主编. 中国生育数据集.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1995
- 3 Norusis M.J. SPSS Advanced Statistics 6. 1. SPSS Inc. 1994
- 4 郭震威, 李勇军. 农村妇女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见: 蒋正华主编. 1992年中国生育率抽样调查论文集.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1996
- 5 吴忠, 刘鸿雁. 避孕方式对生育水平的影响. 见: 蒋正华主编. 1992年中国生育率抽样调查论文集.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1996
- 6 郭友宁等. 上海市新婚夫妇避孕使用动力学的研究. 见: 李宏规主编. 生殖健康社会科学研究进展.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1996

(上接第64页)

系,系统地讨论了老年人的心理卫生与心理咨询问题,认为必须把老年心理咨询服务工作提高 to 战略高度来认识,全社会都来关心。上海的傅惠霖提出:在社区建立自我保健网络和家庭护理照料网络十分必要。生活不能自理又无子女照料的老人生活怎么办?广西梧州的经验之一是成立包护小组,发展社会化助老事业。上海静安区1994年抽样调查了一个社区中的317名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结果表明:50%以上对健康的自我感觉很好或较好。但调查也发现,随年龄增长,生理、心理或病理的影响增多,对医疗保健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各种需求相应增多。进一步拓展和发展社区服务功能,对维护高龄老人的生存质量意义重大。但高龄老人的常见慢性疾病,不少也是可以通过适当的三级预防和康复措施使之稳定或改善。事实上,静安区初步形成的三级老年医疗保健网络已取得成效。朱即明、李立奎对上海的总体分析表明:目前上海高龄老人的比例正在不断攀升,而高龄老人患病率最高的前三种疾病是:心血管病、呼吸系统病、脑血管病。这些病多数是慢性病,需要照顾的时间较长。根据1995年上海的调查,约有4/5的老人需要不同程度的照料。朱、李提出了为高龄老人建立护理资助基金和积极开展老年护理保险试点的建议。夏传玲对影响老年

人长期护理需求的因素进行了定量研究,提高了对长期护理需求的测量精度,第一次在个体的层次上,确定了影响长期护理需求的五类因素的效应规模,从而为预测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长期护理需求,奠定了基础。同时,该文也为长期护理的个案管理和老年人的自我保健提供了参考依据。人口高龄化的态势和问题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关注。

西安人体机能研究室在过去五年中通过三次专项心理调查,研究了老年知识分子的衰老特点,获得一些重要的结论。刘翊纶等教授的研究表明:与中青年时期比较,迈入老年后人体的确会发生各种衰老的变化,在60~90岁之间存在着一个衰老稳定期,但此期之长短因人而异。衰老与年龄并非严格同步增长。如果勤于用脑,重视养生,衰老可以延缓。通过调查,他们概括出了一套老年知识分子系统心理建设的新框架:诸如愉快退休、营造家庭、改善条件、减少疾病、延缓衰老、参与社会、创造生活、享受学习、挑战人生、领悟归宿。

八、余论

与会论文很多,本纪要难免挂一漏万,这是要请与会代表和读者朋友鉴谅的。所幸,会前已经有《论文摘要》影印,会后也将有优秀论文的汇编问世。读者朋友若要深入了解,自可按图索骥,各取所需。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 北京 100872)